

探寻百年大党的成功密码

——读《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

■蒋国海

读史札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欧阳淞主编,集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历时4年完成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该书的出版,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助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重要的学术支持与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是一部以宏阔深邃的视角,全景展示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建设历程的通史著作,填补了该领域系统性通史研究的空白。该

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史”结项成果,入选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该书的作者编辑团队汇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于2021年10月动笔编纂,到2025年12月付梓,4年的光阴,凝聚着作者编辑团队的严谨细致。为确保每一处历史叙述的权威准确,编纂团队前后进行多次修订,从选题到书稿,从加工到审校,从整体构思到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编纂团队都精益求精,力求使之成为代表当前党史党建研究和出版水准的标杆性作品。

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献作全面分析;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文献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描述历史。无论是对党的建设发展历史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作者都力图贯穿上述原则。

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性工程,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为遵循,从党的创建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五个时间段依次展开,以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新的伟大工程和六次最具标志性的自我革命为重点,深刻揭示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成功密码。

该书是集权威性、系统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党建史著作,不仅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读者深入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提供了宝贵教材。该书的出版也将助力全党全社会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党建规律,为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理论滋养。

学习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可以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全貌有更多了解,对党的建设的特点、规律有总体的理解,有利于进一步探索解决党的建设现实问题的途径、方法。

该书史料翔实可靠。书中所依据和引用的史料基本上是第一手的,主要是原著、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党的历史文献、党的领导人的著作讲话等。作者依据这些资料,使该书反映了党的自身建设历史的本来面貌。

全书采用条块结合的研究方法,遵

循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线索,研究和探索了党的建设规律,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实现理论高度与历史深度相结合。读者既可以从中获得理论的启示,也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作者把党的建设史、党的建设原理、党的建设学说史严格地加以区分,既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又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下的自身建设实践及其规律的历史科学。这就指明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指出了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作者还把党的建设历史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时期,同时阐明了党的建设各个时期的特点。书中的每一章首先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形势,指出党的建设任务,然后阐述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建设的具体实践,这一时期党的组织概况,最后对党在这一时期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给予总结,探索了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书中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五卷本)还为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党务工作者吸取党的历史经验,做好当前党的建设工作提供有益帮助;也是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增强党性、提高素质的良好教材。

深阅读



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140周年。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朱德同志的革命风范与军事智慧至今熠熠生辉。

近日,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庾平撰写,系统阐释其军事思想精髓的学术作品《朱德论兵》,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是学界近年研究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朱德军事实践与理论贡献的深情回望。

庾平曾任职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后转业至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他曾参与编写《朱德年谱(新编本)》《朱德诗词集(新编本)》《朱德自述》等著作,是朱德军事思想研究领域的专家。

朱德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共同认识的基础上,由朱德进行理论概括的关于建军、用兵、治军等军事问题的指导思想。《朱德论兵》依据朱德本人的文章、著作、报告、信函、谈话、命令和指示,紧扣“兵”这一主题,从带兵、养兵、练兵、用兵、反“围剿”、抗日游击战争、总力战、国防建设八个方面,结合朱德波澜壮阔的军事实践,系统阐释其军事思想精髓。

带兵、养兵、练兵、用兵,是朱德军事思想中关于建军基本问题的核心内容。朱德明确指出:“建军的基本问题,是要学会我们自己的建军方法,学会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带兵、养兵、练兵、用兵。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关于带兵,朱德的要诀在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灵魂塑造。1943年10月16日,他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并作《论军队的管理问题》报告,指出:“带兵带好,要有各方面的保证,首先是政治上的保证,就是靠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带兵者必须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以提高战士阶级觉悟为根本,尤其要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身教重于言教。

关于养兵,朱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养兵的最主要方法是切实保障军队的物质营养,既注重精神营养,也注重物质营养,要求带兵干部在政治上和物质生活上关心士兵,倡导官兵平等待遇。长征途中,当中央红军快到毛儿盖时,炊事员见朱德两天未进食,便用自己省下的一点米煮了稀饭端来。朱德却将稀饭分给伤病员。这一细节令人动容,真切体现了朱德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崇高品质。

关于练兵,朱德强调要把部队训练成“国家民族的劲旅,成为党无坚不摧、无坚不摧的铁军”。1945年4月2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提出练兵的三方面:智力、体力、技术。练智力重在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练体力是提高战斗力的“唯一要件”,因为“打仗是格斗,是角力”;练技术则要求每个战士熟练使用武器,发挥其最高威力。朱德身体力行,常在操场上指导官兵练体力,亲自示范撑竿跳高,深入部队帮助解决技术难题。

关于用兵,朱德的用兵之道是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他指出:“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他把用兵之道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并称之为“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带兵、养兵、练兵、用兵,各有侧重

思想谋略与赤子情怀交相辉映

——读《朱德论兵》有感

■褚银

又相互贯通,构成朱德治军用兵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朱德在不同时期提出诸多影响深远的军事主张,使其军事思想呈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脉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1931年7月第二期、第三期上,连续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强调创造铁的红军是党的迫切任务。1933年3月6日,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编印的刊物《革命与战争》第6期上,朱德发表《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针对工农出身的指挥员在战斗中的实际困难,结合苏联战术参考资料、日本《步兵操典》及自身经验提出具体要求。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将战争制胜一般规律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总力战”思想,书中从“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等维度进行阐释。朱德坚持“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强调“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采取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地误解”,彰显其军事思想的深刻性与前瞻性。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国防建设提出诸多远见。他根据二战后多军兵种和武器装备的新发展,科学判断现代化战争是“在原子战争条件下”即核条件下的“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他要求全军毫不自满,认真学习掌握新技术,学会诸兵种和联合作战本领。他强调用尖端技术武装军队,建立现代化后方勤务,加强诸军兵种建设,大量培养现代化国防军所需的干部。这些思想至今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朱德论兵》彰显朱德军事思想的光辉,诠释了历久弥新的军事智慧,是一部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朱德军事思想的学术著作。研读此书,既能领略军事家的思想谋略,也能感悟革命先辈的赤子情怀。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陈祥榕的故事》(国防工业出版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记述了戍边英雄陈祥榕的成长故事。该书分三部分追溯英雄的成长历程:少年时期,他经历亲人离世、生活困顿,早早坚韧自立;受忠厚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孝老助人、勤俭守信,常怀善意;生长在红色老区,革命先辈与家族参军传统,让他深植报国理想,入伍后主动奔赴边疆戍边。

本书跳出单一叙事,串联起英雄的个人成长、家风文脉与红色沃土,以真实细节诠释英雄炽热的爱国信仰。该书依托一手纪实素材,文字朴实动人,富有思想感染力。“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如今,英雄的话已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最深情的告白。

(潘新霞)

从地方志中汲取正确政绩观滋养

■向贤彪

文渊采英

在文献资料中,地方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具有存史功能,能将一定地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民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用文字记录下来,供人查考,具有资治功能。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读一点地方志,可以从汲取丰厚的滋养,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地方志中感悟民生理念。《休宁县志》中,记载了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思想家戴震的生平及民生理念。戴震出生于徽州休宁隆阜的一个布商家庭,自幼志在闻道,且“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在修纂《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寿阳县志》等地方志著作中,他始终将考察“民之利病”放在重要位置,特别强调“古今因革,山川形势,政之体要,民之利病”,以使“志中之事、地事观事存

焉,求其切民用,达治道也”。戴震将地方志视为经世济民的用世之书,将修志视为关乎国计、利于民生的要事,并提出许多关注民疾、利于民生的主张。这不仅是他民生理念的结晶,也是其忧患意识的体现。

从地方志中感悟爱民情怀。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为政以德”“民心惟本”的治理智慧,提出“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的价值尺度,将民生福祉置于评判中心,作为施政的首要之务。这一重要理念在地方志中得以充分体现,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看到了一个个以民生福祉为念的好官形象。

习主席曾在不同场合讲述过一代文豪冯梦龙在福建寿宁为官的故事。明崇祯七年至十一年(1634—1638),冯梦龙来到福建寿宁任知县。从江南富庶之地来到偏远贫瘠的寿宁,他紧锣密鼓地干了许多实事。在发展经济上,他兴修水利,修建东坝,引水灌溉农田,改革仓储赋税,减轻徭役,鼓励百姓开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在社会治理上,他平息虎患,惩治豪强恶霸,修复城防关隘,公正

断案,倡导“无讼”;在移风易俗上,他革除落后陋习,严禁溺弃女婴……一件件好事实事,深得民心,影响深远。

从地方志中感悟清廉品格。勤政与廉政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好官的标准。勤政要求权力不闲置,杜绝怠政失责,用手中之权力多为群众办好事;廉政则要求权力不乱用,防止以权谋私。在地方志中,既有对好官勤政的颂扬,也有对他们廉政的褒奖。

明嘉靖年间,江西高安县知县汪烜,为官几十年,不仅以勤政闻名,而且以廉政著称。他的哥哥去找他,汪烜从简招待,在哥哥离开时他也没有送什么值钱的礼物,令哥哥心生不满,认为弟弟发达后变心。后汪烜告老归家时,他的哥哥躲在汪烜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看到汪烜身上背有一行囊,以为是弟弟为官的积蓄,便抢过包裹打开看,发现里面除了几件破旧衣服外别无他物,这才知道错怪了弟弟。

还有清光绪年间,任陕西三原县知县的焦云龙。上海《申报》在登载他的事迹时,称赞他:“公在池阳,视民如伤,五

日在城,五日在乡”。他不但勤劳为民,而且清廉如水。据《潼关县志》记载:焦云龙为官多年,家中却素无余积。他去世之时,家人无力安葬,在潼关道台谭启瑞资助下,才得以安葬在潼关东山。潼关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自发修建了焦公祠,上书:“满原共拜仁人赐,合社均沾雨露恩”,并于每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庙会,以缅怀焦云龙的政德政绩。

史学家章学诚有言:“史志之书,有神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地方志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和教化功能。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阅读一点地方志,除了获取对当地流传史册的历史名人、民俗民风的了解外,还能体会先贤的政绩政德,明白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官、做什么样的事才能永存史册,才会让百姓念念不忘,从而自觉校正自己的政绩观,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理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通往信仰深处的心灵之路

■曹展

书里书外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重新翻开战友夏桂林的《我的长征记》(中国林业出版社),一个关于坚守与信仰的故事缓缓铺开。这部著作,曾得到老红军向守志上将的题字鼓励。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记或随笔,而是一位军转警察用脚步丈量历史、用心灵对话先辈的记录。

200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活动《我的长征》,征召28名志愿队员全程徒步重走长征路。时年50岁的夏桂林从5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他从福建汀汀出发,历时251天,徒步9省,于2007年1月5日抵达甘肃会宁。8个多月的跋涉,他写下9本日记,拍了万余张照片,最终将这段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整理成书。阅读这部作品,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长征路,更是一条通往信仰深处的心灵之路。

夏桂林踏上长征路的动因,并非一时冲动。他出生在江西修水——秋收起义的发生地。小学时,每逢清明,他和同

学们都会去给烈士扫墓,红军的故事自那时便镌刻进他心里。长大后,军旅经历使他与那段历史保持着绵延不绝的联系。在部队期间,他曾四次荣立三等功,红军精神早已在血脉里生根发芽。

然而,真正驱使他在50岁万里跋涉的,还有另一股力量。他坦言:“我是农民的儿子,到了大城市后,条件好了,但惰性却在滋长。到一个地方,如果能坐车,绝对不走路。这让我感到害怕,我要找回那个原来的自己。”

这正是《我的长征记》打动我的一个原因:它记录的不仅是一段物理空间上的跋涉,更是一场精神上的追求。在一个物质日益丰裕的时代,作者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锚点——当舒适区让我们的感官渐渐麻木,我们是否还有勇气像他一样,用朴素的方式去寻回精神的重量?

长征路上究竟有多苦?作者给出了不加修饰的回答。当时,志愿队队员们每人背负数十斤的行囊,脚下经常磨出水泡。在海拔4800米的四川山区,高原反应袭来,牙疼、头痛交加,吃不下、睡不着。为了消除牙齿痛感,他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硬拔掉一颗牙,肿着腮帮子继续前行。他准备了四种睡袋,睡过乡政

府的办公室、简陋的小学学校,也曾露宿草地。更让人惊心的是蚂蟥侵袭。爬雪山前,队员们遭遇大片蚂蟥叮咬,拽不下来,只能用烟头烫,许多人的腿上留下永久黑疤……

在这部作品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莫过于作者对红军先烈的一次次祭奠。途经贵州省合江县时,他被几10座散落山间的红军墓深深震撼。待队员们走后,他独自重返陵园,坐在墓前放声大哭。“70年了,他们一直静静地躺在这异土他乡,他们的亲人多年后还在期盼着他们回家……”在遵义烈士陵园,一面长长的墙上刻着3000多个名字。他用手一一抚过那些镌刻在青石上的笔画,泪如泉涌。湘江战役旧址前,望着平静的江面,他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敢相信,这片静谧的土地之下,曾埋藏过那样惨烈的牺牲。

阅读这些文字,我深感自己与那段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从未真正了解过那些无名墓碑下的生命,有着怎样的热血与悲歌。而作者用他的眼泪,为我弥合了这道裂隙。他让我明白,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时间和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用生命写就的。那些红军战士,也曾是别人的丈夫、兄弟、儿子。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他们

长眠的土地值得一代代回望。

走完长征路归来,作者的头发已然变白。他刮去胡须,染黑头发,第二天便去单位上班了,一切仿佛重回旧轨。然而,他自己清楚知道,内心深处已被彻底改写。

我觉得这种改写,是一种被崇高之物撞击后留下的印记。这是长征赠予他的厚重珍贵的礼物。从此,他把传播红军精神和长征文化视作自己的责任,多次走进校园为师生讲述长征故事。



迷彩书屋

第6731期

